

，民主國家再也沒有什麼屏障可言。因此，我們深怕在所謂談判與和解的氣氛中，首先犧牲的是東南亞各國，而我在海外華人，百分之八十羣居於此，又如何不遭其殃，過得生活？自然這是我們之所關懷，我們自應有其所以肆應之道。

我覺得東南亞各國應作政治磋商，同時尋求經濟合作，切勿輕與俄毛來談判交往，這只將會引狼入室，而無法以求苟安。因為共黨有其奴役全人類的最後目標，一意埋葬自由世界，雖在高唱所謂談判與和解的現階段，也不會有其實質的改變，大家豈可任令宰割，坐以待斃。關於此，我們自望東南亞各國能有所醒覺。

為使我們與我們的鄰邦的合作關係不斷加強，彼此溝通反共思想，交換反共經驗是必要的。於此，首先就要我在海外同胞之瞭解中華民國在臺灣復興基地政治經濟各項措施的進步，準備突破國際上的任何逆流，為完成反攻復國的神聖任務而奮鬥。這是值得對外多所宣傳，並歡迎他們來此觀光考

從打倒走資派到批林批孔

尹慶耀

毛共內部從打倒走資派到批林批孔，是一場思想鬥爭，也是一場經濟路線的鬥爭。前二者國內談論的較多，本文擬從後一角度對毛共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作一次分析。但以篇幅所限，還不能對經濟路線的鬥爭作正面、全面的檢討。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中，有一篇以「中國（毛共）經濟建設中的兩條路線的鬥爭」為題，指出毛共經濟建設中的種種歷史事實，說明毛共黨內存在着兩條相互對立的路線，一條是體現社會主義建設利益的社會主義路線，另一條是利用社會主義來達到自私目的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路線。毛澤東是民族主義路線的領導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毛澤東搬出所謂三面紅旗，就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個方針把毛共經濟引上了破產的邊緣。

察，以加深認識。

老實說，無論其為華僑抑華裔，無不具有強烈之民族感，但都愛好自由而反暴政，沒有到過中國大陸的人，誰不寄以迷夢，但一去過了，也就看出其真面貌，而有所醒悟。祇是為免惹禍，他是不會輕易表露其憤怒的，去年筆者到歐美，遇到許多僑胞，知道我們來自台灣，就會默默傾訴其對共黨之如何深惡痛絕。即其居留地已與毛共建交者，他們的反共意識尤見加深，無疑那是一股強大的抗暴潛力，我們應該知所運用。過去我們從事海外工作，毛病就在只問誰是「忠貞」，予以種種便利與優遇，而忽視了這沉默的一羣；其實忠貞責諸於己，而非課之於衆，蔣總統也曾訓示我們「不是敵人，便是同志」，我們要有這胸襟來策使其一心一德，羣策羣力，為我們國家民族及其居留地區盡其偉大的貢獻。否則，共黨乘虛而入，滲透於其間，久而久之，也就居不得了。印尼緬甸華僑遭受慘禍，前車可鑑，這是我們之所關切，應當有其對策的。

毛澤東自己也強調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所謂兩條道路，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他所謂兩條路線，是革命路線和反革命路線。他的說法是抄襲自史達林。史達林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在第一次全蘇維埃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有下列幾段話：

「舊制度與集體農莊的新制度有什麼區別呢？」

「……舊制度引向於資本主義。而新制度引向於社會主義。

「你們看，這裏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條是向前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向後退到資

本主義的道路。

「有人以為有什麼第三條道路可走。……他們想要我們恢復舊制度，恢復個體經濟，不過是不要地主和資本家而已。同時，他們要我們『只』容許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小資本家存在，作為我國經濟制度中的正當現象。其實，這並不是第三條道路，而是第二條道路，即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

「所以，只有兩條道路：或者是向前走，向上走到新制度，即集體農莊制度；或者是往後退，向下走到舊制度，即富農資本家制度。」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①。

兩相比較，毛澤東使用的名詞更合乎共產主義的「經典」，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中，毛澤東的理論，也大致依循着史達林的思想路線展開。但這并不能保證毛澤東路線的正確、合理、會獲得成功。相反的，正是由於這條路線，才使得毛共比其他共黨遭到更大的失敗。

依照前引莫斯科廣播的說法，毛共黨內經濟上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從一九五八年三面紅旗時代開始的。毛共何以要在此一時刻採取此一政策路線呢？這當然也有他的現實背景。

二

毛共從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蘇聯援助下，其經濟建設確有一些成就。但它完全仿照蘇聯的方式，在政策上「重工輕農」、「重重輕輕」，其結果自然是工農生產嚴重脫節，輕重工業失却平衡。此外，從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中國大陸增加了二、〇〇〇萬勞動人口，但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毛共經濟建設集中在工業部門，而且是一些資本密集部門，并非勞動密集部門，所能吸收的勞動者僅僅一七八萬人，當其新增勞動人口的九%②，其餘的都留在農村。於是，資金短絀和勞動力過剩，對大陸農業形成嚴重威脅。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在毛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過關於「十大關係」的報告，要求「全黨注意正確處理」。這十大關係是：（一）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係；（二）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三）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四）國家、合作社和個人的關係；（五）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六）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七）黨和非黨的關係；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九）黨內和黨外的是非關係；（十）國際關係。

這十大關係至少前五項都和經濟直接有關。其中，關於第一和第五項，提出了「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條件下，工業農業同時并举的原則」，以及「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互相結合的原則」；關於第二和第三項提出「必須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地集中資金在經濟建設方面」；關於第四項則強調必須「正確地處理個人和集體、局部和整體、消費和積累的關係」。這似乎是對經建中欲輕欲重的一種補救方案。至於農業方面資金短絀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毛共領導者所想出來的對策，是以過剩的勞動力代替建設資金，於是從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毛共動員了一億人口來大修水利工程，這可看作大躍進的濫觴。

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二十大大會反史之後，毛蘇共之間就有了齟齬。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一次世共會議中，雙方又有了「戰爭與和平」的爭論，但當時并未影響及於它們間的「國家關係」。而且，儘管事後毛共在有意地羅織證據與罪狀，我們也不相信毛劉之間，老早就有經濟方面兩條路線的鬥爭。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黑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中，提出各種重要產品在十五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的口號，各共產國家立即刮起一陣趕超風，東德要趕超西德，北韓要趕超日本。同年十二月二日毛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八次大會中，也提出「在今後十五年內，要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這顯示毛共仍然在追隨蘇共。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劉少奇代表毛共中央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作的工作報告中，提出「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等口號。這本來就是毛澤東「十大關係」中的舊話重提，但是，這麼多並舉需要資金、設備、技術、原料、勞力以及正確的政策、計劃等等。同月十六日，陳雲、李富春、葉季壯等乘列席「經濟互助委員會」會議之便，會晤黑魯曉夫要求經援而不得③，毛澤東於失望之餘，又加提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並舉，（連同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並舉）合稱五並舉，又叫兩條腿走路。此後，三面紅旗就正式展開了。

三

三面紅旗失敗的史實，勿庸在此贅述。不過，以此為導因，使毛蘇共間以及毛共內部展開了經濟方面兩條路線的鬥爭，倒是值得一提的。

如前所述，毛共的經濟是在蘇聯扶掖下成長的，毛共的三面紅旗也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受有蘇聯的影響。但當雙方由意識形態的論爭影響到國家關係時，蘇聯對毛共實行了經濟制裁，一九六〇年蘇聯的撤援給予毛共的打擊是慘重的，這使得毛共始終耿耿於懷，隨時隨地都加以抨擊，而且迫得毛澤東堅決地走其「自力更生」的道路。此後，毛蘇共間在經濟方面的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爭，實際也與此有關。

毛共黨內經濟方面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們不想像蘇聯那樣回溯到太早。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毛共七屆六中全會時，毛澤東提出所謂「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中也說：「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大躍進，不但是反右派鬥爭和整風運動勝利發展的結果，而且是正確執行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結果」。毛共在經建方面變得有點兒冒進，或許是現實情勢逼處此，劉少奇當時未必反毛。然而，三面紅旗政策無疑是毛澤東的主張，它一起步就敗象畢露。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日，毛共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不情願的放棄偽政權下屆主席職位，由劉少奇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在二屆「人大」一次大會中當選繼任。一九六〇年三面紅旗已徹底失敗，又有連續的自然災害，再加上同年七月的蘇聯撤援，使得毛共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毛共在平舉行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在工業上改採「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農業上厲行全黨轉入農村，大辦糧食。此後毛共經濟就進入調整期。讓劉少奇當偽政權主席，毛澤東退居幕後，可以解釋成是搞一、二線^④。記得一九六〇年左右，毛澤東還對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說劉少奇是他的繼承人，本來是不應該有問題的。不過，有幾點可能是造成毛劉分歧的原因。

從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中國大陸有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實際上造成災害的原因，人為的成分要大過自然的成分，那導源於毛澤東三面紅旗政策的錯誤，因此毛共黨內也有不少反對者。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以「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看待新生事物」為題，選錄馬、恩、列、史、毛等有關文章，在「編者按」中強調「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新生事物應當

採取熱情對待，堅決保護和積極扶植的態度，而絕不應當採取冷淡、譏諷、指責以至打擊的態度」。可是，這篇文章不曾發生什麼效果。黨內的高級知識份子都變成「牛鬼蛇神」，趁着災害造成的困難期間「紛紛出籠」。這些人以「三家村黑店」為核心，託庇在彭真的「北京獨立王國」，對毛澤東的「新生事物」，偏要冷嘲熱諷^⑤，而彭真乃是劉少奇的嫡系。

一九六一年冬，毛共制訂有關工業政策措施七十條，規定所有基本建設工程，除特准者外，一律停止施工。長期虧累的企業，除特准者外，一律關閉停辦。一九六二年九月毛共八屆十中全會，又進一步要求「堅決地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支援農業的軌道上來」，以加強發展農業。黨內的政策調整，應該是經過毛澤東的。不過，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教育部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指責劉少奇的「十項大罪」和毛共後來批判劉少奇的「黑六論」^⑥等等看來，劉少奇曾經執行了與毛澤東相反的經濟路線。又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澤東在毛共中央政治局匯報上講話時說：「鄧小平耳朶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⑦。可見劉、鄧在當時即使不是公開反毛，但因對毛的經濟政策不滿，乃敬而遠之或陽奉陰違。

前引劉少奇「十項大罪」中的第七項是：一九六二年，劉少奇控制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鼓勵「翻案風」、「單幹風」和各種歪風邪氣，支持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直接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⑧的罪魁禍首。在毛澤東心目中，劉少奇所走的正是史達林所說的，那并非第三條道路，而是第二條道路。

經過劉少奇時期的經濟調整，毛共勉強渡過了三年大饑荒，一九六二年經濟情況開始好轉，一九六四年左右漸漸恢復了元氣。可是，這種由一時「退却」換來的「成就」，會使得黨內更加認清毛澤東路線的錯誤，黨外更加認清共產制度的錯誤，繼續發展下去將勢難回頭。毛澤東自然不能聽任反毛反共的情緒長期持續，乃於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毛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於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決定劉少奇必須下台^⑨。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黑魯曉夫」來予以打倒，同時砸爛了黨政機構和公、檢、法系統，但將軍隊除外，并強調「抓革命、促生產」。

美國已故左傾作家兼記者埃德加·史諾於一九七〇年訪問了毛澤東以後透露：

「毛澤東永遠是黨的主席，劉是他的第一『副主席』。但是，一九六四年，毛失去了對他的『繼承人』組成的大部分機構、首先是國家機構的實際控制。譬如，一九六五年，他甚至不能在北京的黨報上發表一篇重要文章，文章的目的是開始文化革命的宣傳階段。毛不得不以小冊子的方式在上海發表它。

「劉及其在中央委員會的盟友一直利用毛的名望，利用國家、工會、黨校、政治幹部和官員來施展陰謀。確實，很多幹部都認為自己是真正的毛澤東主義者，但是，劉以及同劉一樣思想的那些同夥特別在一九五九到六一年的經濟危機之後，在理論上利用了對毛的崇拜，在實際上侮辱了毛主義。他們注重經濟而不注重人，他們大搞物質刺激，他們不強調階級鬥爭而只搞生產，他們只靠『專家』來提高技術水平，搞政治為經濟權力和技術權力服務。他們主張擴大國家信貸（以及國家債務），而不是『大躍進』，不是以積極的勞動的思想熱情來作資本」⑩。

由此看來，劉少奇最初雖則未曾反毛，但在大躍進失敗後尤其是進入六〇年代，毛劉之間就確有矛盾。劉派不願接受大躍進期間的新生物，毛派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造反奪權的方式掀起全面鬥爭，但其焦點乃是經濟方面兩條路線的鬥爭。而史諾所敘述的就是雙方分歧的焦點。

四

毛林間的鬥爭是另外一回事。除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毛共「中央中發（一九七二）四號」文件附發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所記載的以外，林彪生前并無有反毛的紀錄。相反的，毛澤東是依靠林彪槍桿子的「三支兩軍」，才贏得了造反奪權的勝利，為此林彪才在九大黨章和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毛共九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偽「憲法修改草案」總綱裏，成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依我們看，毛林衝突是文革以後的事。因為在「三支兩軍」過程中，軍權過分膨脹，軍人掌握了各地黨委會和革委會，使毛澤東的黨權受到威脅。再則據毛澤東說，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時，林（彪）陳（伯達）於八月二十

三、二十四到二十五日中午，發動了兩天半的突然襲擊，「有人（當然是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⑪。

林系軍人掌握了地方，林彪本人再當「國家主席」，就會使得有搞一、二線慘痛經驗的毛澤東不得不警惕了。林彪掌握了軍權，不曾真正掌握黨權和政權，因而也就不會掌握經濟權，他和毛之間應該沒有經濟上兩條路線的鬥爭。不過，毛共的內部鬥爭一向是思想、政治、經濟等等渾然一體的，被打擊者常常是具有多種罪名、集衆謗於一身、帶有殺雞儆猴作用的反動典型。而且，如果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派不會在經濟戰線上獲得全勝，林彪自然就會在被鬥過程中成為劉少奇罪名的「接班人」了。

一九七〇年九月即毛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所謂「批修整風」運動即開始醞釀，最初是以陳伯達為對象。一九七一年毛共「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傳達了毛澤東「在全黨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四月間毛澤東在黨內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五月「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多篇「批修整風」言論，該一運動就正式展開。毛共用「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號稱懂得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却根本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和「口稱小小老百姓，實則大大野心家」⑫等來隱指陳伯達。

毛共又用「劉少奇一類騙子」來影射林彪。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毛共建黨五十週年，「兩報一刊」紀念專文中，出現「野心家、陰謀家、叛徒、特務、裏通外國」等頭銜，後來也都贈給林彪。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出巡，為整林佈局。九月十二日晚，發生「林彪武裝反毛、陰謀暗殺毛澤東、事敗乘機逃俄、墜機斃命外蒙」事件。一九七二年元旦「兩報一刊」社論，未指名暗示了林彪的三大罪狀是「裏通外國」、陰謀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和「復辟資本主義」。這和劉少奇的罪狀是如何的相似啊！稱他為「劉少奇一類騙子」，真是十分恰當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事件後，毛共黨內發表了不少「絕密文件」，為林彪羅織了幾十種罪名，所謂「林陳反黨集團」、「改稱林彪反黨集團」、「批修整風」也變成了「批林整風」。不過，對外公開却是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以後的事。

至於批孔，就毛共說來只是舊戲新唱。但最近的批孔運動，也有些特異處。一九七二年「紅旗」雜誌第十二期刊載了一向全面否定孔子的廣州「中山

大學」教授楊榮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從儒法論爭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一文，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這一次的批孔，即沿着此二文的方向進行。同年「紅旗」雜誌第十二期刊載天津市電磁線廠工人評論組文章「把批孔和批林結合起來」。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則號召「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

本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馮友蘭即曾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一文的末段裏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縱深發展。在中國哲學史領域內，正經歷一場新的革命。毛××親自領導，指示方向」^⑬。前引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一開頭就說明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下，一場羣衆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鬥爭，正在各個方面展開」。另據五月六日出版的美國「新聞週刊」報導，像過去的文章小組一樣，現今毛共中央也成立了「批林批孔辦公室」，由江青任主任，張春橋和姚文元任副主任，王洪文則任顧問。這真可稱爲文革的繼續或另一場文革。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指「林彪這個政治騙子，不讀書，不看報，不看文件，是個什麼學問也沒有的大黨閥、大軍閥」。但又條分縷析地指出林彪如何宣揚、鼓吹孔孟之道，企圖「把孔孟之道作爲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思想武器」。這不是可笑的矛盾嗎？實則社論業已說明：「……批孔確是批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老根，是爲了更好地批林」。這是說批孔是爲了批林。

大陸上不少人在懷疑，孔子已死了兩千多年，何必再批他？其實林彪粉身碎骨也有三年了，爲什麼還要繼續批呢？讓我們說，批死人是爲了批活人，孔、林的罪惡觀念，都還活在活人的腦子裏。我們這樣說是有證據的。一九七四年「紅旗」雜誌第二期的短評「廣泛深入開展批林批孔的鬥爭」，指出了爲什麼要批林批孔。短評說：「批林批孔，觸及到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許多方面。有一些剝削階級的傳統觀念，如輕視勞動，蔑視婦女，瞧不起工農羣衆，看不慣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崇洋復古，以及「開後門」之類的不正之風，這些除了有它們的社會階級根源外，都可以從孔孟之道那裏找到思想根源。在批林批孔的鬥爭中，要通過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子的反動思想，清除這些流毒」。

這些「流毒」在「今」人的腦海裏，要靠斷章取義批判「古」人的話來予以「清除」。又因爲林彪已被打成反革命，把他說成是孔孟之道的信徒、宣揚者，那麼誰要不肯捨棄那些「傳統觀念」，誰不就成了反革命份子、該「清除」的林彪的餘黨？這正是批林批孔的真正意義所在。

五

爲什麼那些「傳統觀念」的「流毒」還遺留在大陸人民的腦海裏，大陸社會的現實裏，須要加以「消除」呢？這又說來話長。

毛共政權抄襲了蘇聯急速工業化且以重工業爲優先的政策，它就遭遇到較蘇聯所遭遇的更大的困難。依照一九三八年「聯共（布）黨史」的說法，蘇聯不能靠採取如劫掠殖民地或戰敗國人民一類的醜惡辦法來吸取工業化資金，資本主義國家又拒絕借款給蘇聯。但蘇聯在國內「找到了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設想的積累來源」，那是沒收資本家地主的工廠、土地、運輸業、銀行、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將其利潤用於繼續擴大工業。再則「……農民免除了每年必須向地主繳納約及五萬萬金盧布的地租。……所以能夠幫助國家來創立新的強大的工業」^⑭。換句話說，蘇聯是依靠沒收人民財產和繼續剝削農民從事資本積累的。

事實上，蘇聯的工業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顯著進展。它確曾用在東歐及中國東北獲取賠款、拆運機器、掠奪物資等「醜惡的辦法」吸取工業化資金，戰爭期間美國援助的機器、物資，也是它工業化的一大助力。毛共沒有這項方便，不過在初期它獲得蘇聯的援助，那「外方資金流入」使它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有所進展。

在掠奪人民財產方面，毛共決不亞於蘇聯。一九四九年竊據大陸之後，就沒收了許多私營企業。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起實行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號召全國人民爲「抗美援朝」獻機獻砲。一九五二年一月的三反、三月的五反，搜刮了不少財產。僅「抗美援朝」一項，「捐獻」所得爲五兆二四六億「人民幣」。以後，因戰爭期間對外購買戰略物資而獲利的私營工商業，以盜竊國家財產罪名受罰的商店、工廠三四萬家，罰金總額達二〇億美元。這些錢除在韓戰中消耗者外，也用之於建設資金。一九五五年末至一九五六年初的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將一

一萬二、〇〇〇家私營工廠、四〇萬家私營商業納入公私合營行列，其收益也納入毛共荷包。然而，就在毛共要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並開始十五年趕超英國時，蘇聯的援助卻不曾立刻到來。於是，毛澤東就實施人民公社，對大陸農村作了最後一次搜刮，並且動員農村過剩勞動人口來全民大鍊鋼，企圖變人口爲人手，變勞動動力爲資金。

統計毛共在大陸掠奪的財產約一〇〇億美元，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九年毛共基本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⑮。可是，大陸社會已蠟盡燈枯，再榨不出油水。毛共的大躍進弄得元氣斷喪殆盡，而蘇聯的援助又撤得一乾二淨，連正在施工中的大工廠也停了擺^⑯。處此情景之下，原本就強調主觀能動性的毛澤東，當然只好更加反對經濟主義、技術主義，而專門訴諸意識形態了。

劉少奇的調整確也收效於一時，但那原非治本之策，而且鼓勵了「資本主義傾向」，被毛澤東認爲「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於是，一九六四年他就提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口號，那是「自力更生」，要人民自己出錢出力、白手起家的搞建設，基本上仍然是在變勞動動力爲資本方面耍花樣。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八日「光明日報」第四版「經濟學」欄，有「山東經濟學會」一次討論會的介紹，標題爲「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勞動積累問題的討論」。會中意見雖有不同，但并不彼此衝突。對於勞動積累的意義，認爲「依靠廣大社員羣衆的革命幹勁，在現有的物質技術條件下，改造自然、改變生產條件，……發展農業生產的最好途徑」。關於怎樣搞好勞動積累，指出的計有：突出政治；以頑強意志、辛勤勞動的精神把廣大社員帶動起來，充份發揮人的因素的作用；加強黨的領導，加強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的作用；挖掘勞動潛力，不斷提高勞動力的利用率，動員和組織社員向集體經濟中投入更多的勞動；通過加強勞動管理和技術改革來提高勞動效率。值得注意的是說：「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解決基本建設所需的資金，爲勞動積累準備必要的物質條件。……由於勞動積累的擴大，農業生產和多種經營的迅速發展，也就爲資金積累的迅速增長打下了可靠的基礎」。

依靠勞動積累促成資金積累，是毛澤東要走的道路，劉少奇也未必反對

從打倒走資派到批林批孔

問題在如何鼓勵勞動的積極性。毛澤東主張政治掛帥，劉少奇偏重物質刺激。事實上後者比較現實有效，但却助長「資本主義傾向」，且有損毛澤東個人聲望。因此，毛澤東就發動文化大革命，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反對利潤掛帥，反對物質刺激，反對專家治廠，反對崇美媚洋，破壞一切舊的規章制度，肅清「三自一包」、「三馬一犁一車」和「四大自由」的「流毒」^⑰。要強調政治掛帥，來「抓革命，促生產」，結果是把生產又「抓」落下來。這不僅使國家、人民公社、個人的關係失調，連帶着也使十大關係中的其他關係失調。

劉少奇實行的只是有限度的經濟合理主義，藉稍稍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其生產情緒，以促進生產量的提高。毛澤東把這稱爲資本主義傾向，稱爲修正主義，那就必須使人民生活永遠停止在最低水平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爲「革命」而生產，因此需要不斷的「鬥私、批修」。可是「私」和「修」永遠鬥不完，反毛澤東的經濟路線已蔚爲潮流，這正是「十大」中周恩來的政治報告和王洪文修改黨章報告中高呼「反潮流」的原因所在。

原本是「大黨閥、大軍閥」的林彪，現在又成了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判徒；把孔子的「克己復禮」故意曲解爲復舊倒退，以便和復辟資本主義扯上關係；強指法家是革新派、儒家是復古派，藉闡述儒法之爭來貶儒崇法，好要人家來保衛文革成果，「支持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周恩來政治報告）；反對輕視勞動，是在政治（口號）上把勞動者抬得高高的，在經濟上剝削得狠狠的；反對蔑視婦女是要婦女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生「半邊天」的作用。這些詞句在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的，骨子裏的陰謀是加重剝削人民的勞動動力。

筆者很同意矢島鈞次先生的觀點，毛共經濟在兩條路線鬥爭過程中，是循着左——右——左——紅——專——紅不斷搖擺的方式下前進的，左和紅造成經濟衰退，右和專使得經濟稍事復蘇，但跟着就又會來一次左、紅的打擊^⑱。本文執筆時，外電報導毛共因生產落後，工業、運輸及通信不斷遭受破壞，政治運動已漸趨消沉^⑲。這或許又到達了由左向右、由紅到專的轉捩點，但鐘擺不會永遠停在那裏不動。

如前所述，一九六〇年時毛共就已號召以積極態度對待新生事物，文革時期要保護大躍進時的新生事物，批林批孔時期要保衛文革時的新生事物，

這無異賽跑者又重回到起點。文革時期打倒劉少奇，藉批判黑魯曉夫修正主義來清除人民腦海裏的「流毒」；批林批孔時期整死林彪，靠挖古墳、罵祖宗、鞭屍來清除人民腦海裏的「流毒」，但流毒是難離肅清的（它發源於毛共的經濟路線）。毛共內部兩條經濟路線的鬥爭將永無休止，這牽涉到很多理論與實際的問題，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容納的了。

註①史達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本，五四九頁。

註②矢島鈞次著「毛共經濟的發展過程」，第三屆中日學術會議論文。

註③黑魯曉夫未立即允援毛共，或係對毛不滿，但蘇聯第六個五年計劃執行不力而中途停止（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發表從一九五九年起實行七年計劃），或亦為原因之一。

註④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毛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線。……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提議的……」。可知一、二線不限於「政」，也非從一九五九年開始。但劉出任偽主席，似可看作搞一、二線之一例。

註⑤「三家村黑店」由「三家村札記」得名。該札記從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二年七月，發表於毛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共計六七篇。由吳南星署名。吳為毛共前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南為馬南邨，即前毛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星為繁星，即前毛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又吳晗編「海瑞罷官」一劇，係一九五九年動筆，一九六〇年脫稿，一九六一年初由馬連良等在平公演。鄧拓的「燕山夜話」共一五三篇，內一五二篇均以馬南邨筆名，發表於一九六一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九月毛共「北京晚報」。以上均諷毛之作。

註⑥毛共批判劉少奇的罪名不可勝數，「黑六論」為階級鬥爭熄滅論、黨內和平論、主要矛盾轉移論、入黨做官論、唯生產力論、剝削有功論。然毛共批判劉少奇者不止此六論。

註⑦「毛澤東思想萬歲」，六六一頁。

註⑧分田到戶係將原來集體耕作的土地，劃分到每一農戶，由每一農戶「包工、包產」；一九六二年間，劉少奇為刺激農民生產情緒，提出「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與包產到戶。由此發展為「包產到

戶」與「單幹」；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平，對各民族解放鬥爭的支援要少」。後毛共指此為劉少奇「用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來同毛澤東的「對外政策總路線對抗」。

註⑨埃德加·史諾於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在義大利「時代」週刊發表的「我們同毛澤東談了話」。

註⑩同右。

註⑪參閱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毛共「中央中發（一九七二）一二號」文件附發（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

註⑫江青曾公開引用陳伯達的話說：「伯達同志常說他自己是小小老百姓」。見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為人民立新功」。

註⑬馮文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三年第四期，同年十二月三日「光明日報」予以轉載。

註⑭參閱一九三八年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共（布）中央審定「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一九四九年毛共「解放社」譯本，四二九—四三〇頁。

註⑮同註②。

註⑯漢人威爾萊特（E.L. Wheelwright）及布魯斯麥克法連（Bruce McFarlane）合著「通向社會主義的中國途徑」一書中稱，當時有一五〇個大工廠在施工中，在其中工作的一千多名蘇聯技師被召回，連藍圖攜走，以後新機器也不再來。作者訪問時，毛共人員告訴他們：「這等於在吃飯時被扔掉了盤碗」，再建費了大事。關於新機器的設計及其工作方法，要從最初學起，必須經過多次試驗。

註⑰「三馬一犁一車」為毛共政權成立後，劉少奇視察東北時所提，希望數年內每一農戶均可達此目標。「四大自由」指放高利貸自由，僱工自由，土地買賣自由，經營自由，為文革時攻擊劉少奇之罪狀。

註⑱同註②。

註⑲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合衆國際社香港電。